

January 2013

The Rhetoric of "New Manchu": With a Focus on *New Manchu* Magazine in Puppet Manchurian State

Xiaoli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Xiaoli. 2013. "The Rhetoric of "New Manchu": With a Focus on *New Manchu* Magazine in Puppet Manchurian Stat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1): pp.86-9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新满洲”的修辞

——以伪满洲国时期的《新满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刘晓丽

摘要:满洲傀儡国炮制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满洲”。文章首先考察“满洲”何以变成“新满洲”。其次透视“新满洲”修辞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一,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有待教化的;二,满洲应该被日本教化、改造为“新满洲”。接着讨论:谁是“新满洲”的快乐子民,进一步解构帝国主义修辞的伪善幻觉。以此,反省殖民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伪满洲国 新满洲 修辞 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刘晓丽,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美学、当代艺术的研究。电子邮箱:xlliu@zhwx.ecnu.edu.cn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AZD061]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文学史(1931-1945)”[12BZW11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Rhetoric of “New Manchu”: With a Focus on *New Manchu Magazine* in Puppet Manchurian State

Abstract: Manchukuo, a puppet state of Japan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China, tried to create an ideology of New Manchu. This paper explored how Manchu was turned into New Manchu, and then discussed the imperialist logic behind the rhetoric of New Manchu. The logic implied that Japan was advanced, civilized and attractive but Manchu was underdeveloped, inferior and uncivilized. Further to the assumption was that Manchu needed to be educated and transformed by Japan. The paper proceeded to discuss who could be the happy subjects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Manchukuo, and from there the paper tries to deconstruct the hypocritical illusions of the imperialist rhetoric.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reflection upo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

Key words: puppet Manchurian State New Manchu rhetoric imperialism

Author: Liu Xiaoli,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6, China), and his research areas cove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a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arts. Email: xlliu@zhwx.ecnu.edu.cn

前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柳条湖附近的一次预谋爆炸,将中国东北——这一清帝祖始之地卷入了东亚政治中心。1932年3月1日,日本军部策划组建“满洲国”,清朝退位皇帝溥仪任执政,定都长春,改称新京,年号“大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称帝,改年号“康德”。“满洲国”标举独立国家,中国国民政府和国际联盟不予承认。^①“满洲国”受日本操控,但又与台湾、朝鲜等日本殖民地施行不同政体,这样一个介于准殖民地与伪国家之

间的暧昧之地,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东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竞技的舞台,也是一次大战后强权政治的演练中心之一,这里是关于土地与所有权的,是关于治理和统治的,是关于建设和掠夺的,也是关于审美形式、形象、想象和修辞的。

“满洲国”建立后,便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的统治,日本军方和满清遗老们各怀政治目的构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满洲、新国家、新国民,为此定制了方方面面的统治方针以及发展规划,不单单是军事和行政的统治,还有系统的文化统治。伪满洲国的文化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宣扬“建国精神”为主,提倡“国策文学”。制定了一系列的文艺法令、制度和纲领。

所谓“国策文学”，就是宣扬新国家的合法性、合理性、美好未来，塑造“满洲国”的国民意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的文艺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服务战争”、“服务时局”为基调，提倡“报国文学”。

如此文化统治背景下，伪满洲国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报刊杂志，其中大型文化杂志《新满洲》刊行时间最长，是伪满洲国重要的文化综合期刊，时人称之为“这老牌杂志，独占满洲杂志的核心”（宋毅 24—26）。本文以《新满洲》杂志为核心，^②展示其关于“新满洲”的想象和修辞。首先考察“新满洲”作为一种帝国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其次透视“新满洲”修辞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最后追问：谁是“新满洲”的快乐子民，进一步解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伪善幻觉。以此，反省殖民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满洲”何以变成“新满洲”

中国东北地区，自清代以来被称为“满洲”，这里的民族组成复杂，有世代生活在此的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赫哲族等原住民；清末开禁后大量汉族人“闯关东”到此地谋生；1896年《清俄密约》允许沙俄在东北建筑“中东铁路”后，俄国人、犹太人、东欧和北欧地区的人们也随之迁徙而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沙皇手中夺去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将大连、旅顺、金州、普兰店以南地区统称为关东州，设立了关东都督府，驻扎关东军，此后日本军人、商人及普通日本人陆续迁居东北。中国进入民国时代后，东北地区主要由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管。1932年日本策划的“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势力在东北迅速扩张，移民越来越多，不仅有日本本土的军人、商人、文人、开拓团农民等，还有日本殖民地如朝鲜、台湾等地来的各色人等。

对于1932年之前居住在满洲地区的人们，无论是汉人、满人、蒙古族人，还是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都没有想过“新满洲”的问题，满洲何来新与旧，每天都新，每天过去都旧。伪满洲国炮制出“新满洲”的修辞，就是要为不合法的政权套上合法性外衣。军事抢占这块土地之后，还要在文化上为其强权政治寻求合法性。

《新满洲》杂志，1939年1月在长春创刊，“满

洲图书株式会社”主办。^③“新满洲”的刊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④所谓的“新满洲”即“新国家”、“新国民”、“新生活”，即所谓的“独立宣言”、“建国宣言”和“执政宣言”中所虚构出的“以建国精神为基石，以日满一体、民族协和、安居乐业为使命”的“新国家”。其办刊宗旨明确宣称为“忠爱、孝义、协和”，和伪满洲国的“仁爱为政本，忠孝为教本，五族协和”的“国策”相一致。《新满洲》创刊不久，就有人撰文《新满洲怎样新的》：

《新满洲》杂志，定名既新，内容亦新，而其他一切一切，都以新为目标，这固然可以达成新使命，来作新时代之新向导，警钟声彻新天地，木铎音震新东亚，使命之大，决心之坚，决非一时一刻的新，就可满足《新满洲》读者的要求，新时代新刊物之本色的。

《新满洲》编辑者，要时常抱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气概，来应付这世路崎岖，文化迭进之新社会，笔铎论断，立意周详，希望鲜若雨后春笋，默缀着新兴满洲，完成文化报国之大旨，不胜企慕，不胜期望了。（刘盛源 25）

仅仅靠这种口号式的抽象宣传，“新满洲—新国家”的文化合法性是建构不起来的。一次大战后的当权者深知文化建构现代共同体的功能，一个介于准殖民地与伪国家之间的暧昧政权，更是要借文化之名来为自己张目了。当权者借文学作品、文化活动、地理研究及开发等一系列科学活动，塑造民意、重塑历史，意在构建“新满洲—新国家”、“新满洲—新国民”——这里是日本的友邦、新青年的乐土、劳工的伊甸园。

具有“官方”背景的《新满洲》杂志创刊即连载两部长篇小说《新旧时代》（作者：陈蕉影，第一卷一月号至十二月号，1939）和《协和之花》（作者：桂林，第一卷一月号至六月号，1939）。《新旧时代》标举“告别旧时代，拥抱新时代”，连续的时间在1932年出现一个节点（nodes），之前贫苦、野蛮，之后幸福、文明。《协和之花》之名与“新满洲”异曲同工，小说写的是一个满洲男青年吴羨云与日本女孩中村芳子的爱情故事，目的明显——塑造“日满一体、民族协和、安居乐业”的“新满洲”的幸福生活。芳子的父亲中村近寿到奉天（沈阳）办学，所谓“播撒文明”、“传播知

识”，后来积劳成疾病逝在满洲，该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吴羨云与中村近寿的女儿芳子，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但是他们俩的爱情并不顺利。中村芳子因为父亲过世，回到了日本东京。而吴羨云被父母逼婚即将成亲，为此吴羨云忧虑成疾病入膏肓。爱情阻碍的消除非常简单，吴羨云的未婚妻突然病亡，婚约自然消失；吴羨云病愈后努力学习，通过留学日本的考试，与芳子在日本相见并在芳子日本亲友的祝福下完婚。这样一篇宣扬“新满洲—新生活”的意义显豁的小说，作者恐怕读者不解其意，结尾处虚构了一段当地报纸的报道：

东京特派员函：

日满两国，同文同种，乃唇齿相连之邦。共存共荣，成不可分离之势。然为两国之百年亲善计，彼此通婚，正为不可少之事。今将日满两国，所乐道之一段协和佳话记之于左。并视协和之花畅开乐土之果早结。

有吴羨云者，奉天人也，年届弱冠，留学于东京之师范大学，客岁卒業。学品具优，才识兼长。氏有女友中村芳子。乃其已故之恩师，中村近寿爱女。年届双十，二人交有五载，心成一体。乃于十月一日，在东京举行结婚典礼，其式典为纯日本式者。闻将来回国，或有纯满式结婚之举。缘既巧合，事复奇异，此诚世人之所希闻者也。记者曾一度访问吴君，问其关于此事之感想，吴君言，此为其素日宿愿，一旦得偿，不胜喜悦并谓将来，必为日满两国协和上，尽以全力，且归国后，从事与教育事业云云。（桂林158）

在《协和之花》这篇小说中，要给生活在满洲的“新青年”一个“新希望”、“新满洲”，若想让满洲青年养成这样的感觉逻辑，仅仅靠小说塑造完美典型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修辞来帮忙。《新满洲》杂志中有专辑——“留学生访问记”（第五卷九月号至十月号连载，1943），让留日学生介绍自己过去的留学生活、现在的“有为”生活以及对未来的畅想。同时刊登“满洲国”民生部专门教育科长吕俊福的报告——《向全国学生公开的报告——介绍给希望留日的学生》，在这篇报告中，不仅介绍了留学日本的具体要求及程序，更重要

的是介绍了“满洲国”的学生在日本的特殊待遇：

以前的留学生，留学当局多半以外国人特别生相待，对于教育管理与本国学生多有异样，譬如对于军事教程、武道、公民等科目，留学生可随意上课，这些学生以为到日本去是学日本科学的，并不是学习日本精神、学做日本人的。[……]（满洲）建国后对于以往留日学生的恶风，就力求改善，一方面派遣严选优秀分子，一方面要求日本学校当局严正以往的歧视态度。[……]学校当局鉴于日满一体的关系，对于留学生的待遇，也改换以往的态度，与日本学生同样相待。（吕俊福 88）

“新满洲—新国家”提升了留日学生的地位，“满洲国”的留日学生与日本本土学生同样待遇，与之相附和的是《满洲国留日学生的生活》（作者：郭凤鸣，《新满洲》第二卷十二月号，1940）的长篇报道。“满洲国”的留日学生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留学生不同，更刻苦努力，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照，也将更有前途，他们人人都似“日满一心一德”的“亲善大使”。

“新满洲”不仅仅是留日新青年的，也该是生活在这篇土地上广大劳工的，当权者没有忘记许诺他们一个梦想。《新满洲》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刊物，图的部分，除了刊登日满政要互访等照片外，多数图片展示满洲大好河山以及建设中的工厂、矿山、城市和乡村。而“各地通信”、“现地报告”、“满洲的现地”、“我们的乡土”、“禹甸河山”等散文随笔栏目，是用文字描绘“满洲国”各地风光，凸显“新满洲”的新建设、新发展、新气象。如：梅月《一日千里的锦州》（第二卷九月号，1940），季守仁《第二松花江堰堤建设地——松花江上大冥想曲》（第三卷五月号，1941），冰旅《炭都之城的抚顺》（第五卷四月号，1943），支羊《土地开发的延寿》（第五卷八月号，1943）等等，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飞速现代化”的土地上的劳工们，怎么不满怀“希望”呢？

教育我的母校

建起了高大的楼房

茫茫的沃野

添设了人家

暮烟笼罩起日落的寒村

电灯在阡陌处尽放豪光

期待吧

建国十几年后的锦绣山河(支羊 71)

岂止周遭世界在“日新月异”,生活在这个“新满洲”土地上的劳工们也在“欣欣向荣”、“日日改变”。疑迟的长篇小说《凯歌》,^⑤塑造了“新满洲”的“新国民”,日本开拓团成员古森来到满洲沙岭屯,带着全村村民开荒拓地,勤劳增产,给沙岭屯带来了增长增收的新气象。这个“新满洲”的“新国民”古森,吃苦耐劳、忠于国家、勇于承担责任。他不仅和沙岭屯的青年农民吴海亭协和相处、同心协力,还改造了村里的大烟鬼和小偷,并对他们“情同手足”,让曾经抽大烟的老马头精神抖擞地说出这样的话:“有一份气,就使出一份力气!非把万恶的英美打败了,不算完!”(疑迟 117)。

满洲傀儡国提供了一种以前的满洲或者中国东北无法提供的新的生活模式,这套新生活模式是由日本亲善、教育、文明、进步、发展、增收、美好未来等概念造成的氛围,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们是“新生活模式”的受益者。这是帝国意识形态——新满洲——的核心内容。

二、“新满洲”修辞的背后

“新满洲”的修辞,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日本构想出来的“满洲新秩序”、“东亚新秩序”,也支持、表现和巩固了“大满洲帝国”的日本殖民扩张的政治实践。而且当我们深入到这些修辞的内部时,即不仅关心这些修辞的内容,也关心这些修辞的形式,以及这些修辞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透视出“新满洲”修辞背后的两个帝国主义视角:一,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有待教化的;二,满洲应该被日本教化、改造为“新满洲”。

《协和之花》这篇爱情小说,是关于满洲男青年被温柔的日本女孩征服的故事,这里没有丝毫的刀光剑影的强迫,爱情的阻碍不在中村芳子这里,中村一家对吴羨云非常友好。在满洲时,芳子父亲中村近寿教授吴羨云知识;在东京时,芳子的母亲和嫂子照顾吴羨云的生活。爱情的阻碍来自吴羨云的父母。吴羨云的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一种旧式的落后的强加式的爱,他们为孩

子花钱定亲,强迫儿子成婚,而这种“旧式的爱”险些送了儿子的性命。落后的旧满洲把青年逼向“活着是没有希望的”(桂林 153)的境地,而文明温柔的日本给满洲青年一种全新的自由生活。

在这个简单的爱情叙事中,作者桂林加入了很多旁逸斜出的描写,比如写吴羨云赴日本留学的行程是这样写的:

吴羨云从家里走后,先到奉天,取道安东,经朝鲜,到釜山。坐海轮“日本丸”。这是羨云有生以来,头一次的尝着海上生活。他在甲板上不时的眺望着海的风景探索着海的神秘。[……]在下关地方,登上友邦大陆的第一步。开始接受友邦的人物。他经过工商府的大阪。历史名地的京都。赏玩过代表友邦的樱花。瞻望过高耸云表的富士山。[……]抵达东京。(桂林 157)

到了东京之后,满洲青年吴羨云又受到一次“文明的洗礼”:

芳子同着羨云,到东京各处去参观,走了三天才把大致走完。什么明治圣德纪念绘画馆啦,靖国神社啦,二重桥啦,上野公园啦,以及宝塚剧场啦,松板屋百货商店啦,银座街夜市啦……等东京的名所,都去了一遭。(桂林 157)

这些对日本、对东京的介绍性的艳羡的描写,与小说内容没有多少关联,作者是在向满洲的读者炫耀日本的现代文明,相比之下,作者把满洲的生活写得落后、迷信:

吴羨云父母为其定制的准新娘生病后,“先找刘大神给扎几针,未见好。”当邻居听说马上就要拜堂的新娘病逝时,厨子老王对老赵说:“当初他们这桩婚姻,八成是没有合婚,不知是谁忌谁,再不就有一头命硬。要不然,刚办喜事,新娘死了,新郎还在闹病。”山东老罗对老李说:“必是先生给看错日子啦,冲犯着什么太岁爷爷啦。”下屋二秃子听说,忙问他妈妈,“新娘死了,还借咱们大公鸡拜天地不。”(桂林 154)

这种文明与迷信、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式描写,透露出这样一种视角——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温柔体贴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

迷信的,有待改造和教化的。这种看待世界的视角,隐藏在塑造“新满洲”意识形态的背后,是要把旧满洲变成“新满洲”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这本来是一种观念性意识形态,却被做成一种事实性描述,在《新满洲》杂志中不断复现。

《新满洲》杂志中的写实栏目以地方报告为主,例如前文提到的“各地通信”、“现地报告”、“满洲的现地”、“我们的乡土”、“禹甸河山”等栏目,共刊出近百篇写实随笔,这种随笔顾名思义是以满洲各地风物为主要内容,编者按这样表述:“这里将莽原满洲的实况,由各地有志之士,以着爱乡爱土的心田,用笔所描绘出来的乡土实体之写真”(34)。而这些“实体之写真”,几乎都采用了日本先进与满洲落后、今日之满洲优秀与昨日之满洲低劣的对比式的修辞策略,满洲正在被改造成文明、进步、现代的“新满洲”,由此这种意识形态观念被演绎成“事实”。

建构出来的观念上的“新满洲”,经过对照式的修辞的不断重复被演绎成事实上的“新满洲”,而这事实上的“新满洲”又催生新的观念——满洲应该被日本教化、改造为文明、现代的“新满洲”——帝国主义观念。

疑迟的长篇小说《凯歌》就是关于改造和教化的故事。这篇小说,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世界,满洲沙岭屯,一派荒野,本地人世世代代生死死如草木一般麻木不仁,这里有得过且过的懒散 of 农民,肮脏邋遢骂街的妇女,还有小偷和吸食鸦片者,这是一个死水一般快要溃烂的世界。满洲建国后,日本开拓团来到沙岭屯。日本开拓团成员吃苦耐劳、文明卫生,他们开荒拓地,把荒野变成良田。这样一个二元对照的世界被设计出来后,接下的故事便是其中优秀的一元改造落后的一元。在日本开拓团的感召下,当地农民燃起了生活的新希望,死水被搅动起来,当地农民与日本开拓成员一起开荒种地,他们不再懒散麻木,也勤劳起来,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同时还学会了日本人的讲卫生、懂礼貌。而且在日本人古森的教导下,沙岭屯的大烟鬼和小偷也改掉了恶习,与村民们一起干劲十足地“增产出荷”。经过改造和教化过的沙岭屯,从“死水一潭”变得“勃勃生机”。

这里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非常显豁:满洲的土地和人民要求、需要被统治,这是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一致的愿望。

三、谁是“新满洲”的快乐子民

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落后的、低等的满洲需要先进的、文明的日本来统治,把旧满洲变成“新满洲”,变成文明、现代的“王道乐土”的“新满洲”。那么谁是“新满洲”的快乐子民呢?

也许《协和之花》中的吴羨云和中村芳子是吧,但是小说写到这对“日满协和”的小夫妻回到满洲,“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童话般梦幻戛然而止。

那些留学日本回到满洲的青年们生活得如何呢?

看看表 正指五点钟
该是宴会时候了
推开厅堂华丽门
见一屋冷寂挤个满
——却是来早了
啜混黄的茶水 嚼着无聊
心暗忖——最怕第一人
如今偏这末巧
倘使有人来
我准备一句‘昆邦哇’

然后只剩一掬窘迫的笑(冷歌 122)

冷歌这首诗后面有个附记:“某日,应作曲家协会召宴于第一ホテル,准时前往,至,则宴会场尚锁,当由役者开门,独自闷坐,无聊中写下此数句”(冷歌 123)。这是曾经留学日本的满洲诗人冷歌的尴尬时刻、窘迫之态,被日系作曲家协会邀请是不能怠慢的事,但按要求准时抵达后,却被对方辱慢轻视了,最后“只剩下一掬窘迫的笑”。这不仅是冷歌的窘态,也是在满洲与日本人共事的中国文人的生存之窘。

那些“满洲国”的劳工们生活如何?从《新满洲》杂志中“现地报告”等栏目,我们看到满洲的农村急速“工业化”,曾经的农民、地主,变成了领取工薪的“工人”,生活中出现了矿山、制油工厂、制碾米工厂等从未听说过的新东西,还有“共励组合”等新的消费形式,以及许多不知名的现代稀奇事。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给生活在此的人们带来了什么?

工业的扩展,扰碎了农村,农村生活的破碎,这矿工的生活便抓住了他。(王秋萤 163)

这现代工业生活的风景,气势显得异常凶猛,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吵闹的骚音,有时机械们巨大的响声,几乎震碎了每一个人的心脏与神经。(王秋萤 159)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对于这黑色的烟,怪吼的骚音,感到一种兴奋而有趣,同时更幻想着自己凭他一身气力,每天劳作的代价,一定到老的时候会积蓄一点钱的。可是十几年来的时光好像是飞一般的过去了,到现在赚到了什么呢?……他眼见到许多伙伴,有的埋葬在矿坑里,有的已经不知流转哪里去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忍受在这里。(王秋萤 164-65)

自从变成佣工的生活以后,不知为什么原因,他的性格时常烦躁,因此一有微末不如意的事,便会与老婆打得不可开交。

他从前本是守本分的一个农夫,可是现在完全改了性格。那个时候,一个错钱也不会花的。现在却常拿一天劳作得来的工资,跑到村中新开设的小酒馆里喝起酒来。(秋萤 111)

日本殖民者为其自己的经济目的,东北的乡村被迫城市化、迅速地“工业化”。这表明“现代化”的背后,是东亚原有的生活形态——世代生长培育的生活形态——被强暴、撕裂,纯朴的农民走向无望的堕落的生活,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茫然。

来满洲的日本人又如何?已经到中国东北二十年的日本文人稻川朝二曾称自己是“失了故乡的人”。当他回到故乡日本水户时,成了一个连心的故乡都失掉的孤独者。

我自幼就是在这氛围里成长的。我把此地当作无二的怀恋的故乡归来了。遥耸在北方的高铃山的连峰,依然在接迎着我。在城市附近流着的那河川,也默默地在接迎着我。然而,在城市里,到工场上工的工人们,却被汽车溅着一身泥水,苍白着脸在步行着。那个脸却个个都是不认识的。偶尔遇见仿佛在那里

见过的人,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那人见着我,似乎也同样觉察不出来是我。日本的童话上的浦岛太郎从离官到还乡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吧。(稻川朝二 65)

在水户的稻川朝二一家,被“外外道道”的眼神望着,仿佛是流浪的一家。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无疑比中国文人有更多的自由,但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指出:“《艺文指导要纲》的公布,日本人的反感,是对自发性的文艺组织‘文话会’被挤垮并被政府公认的文艺组织統合的反感,也是对文艺被迫从属于‘国策’的恐惧”(冈田英树 61)。他们也不是“新国家”的快乐子民。

帝国主义式的满洲想象,是把“文明”和“现代”带给原始、荒野的满洲,这是一种洗净了殖民地人们苦难的帝国主义修辞。“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了和占有了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制。由于各种原因,它吸引一些人而时常引起另一些人不可名状的困难”(萨义德 6)。这块土地上没有快乐的子民,有的是帝国殖民地制度两边的人和社会的盘根错节的无以名状的困苦。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清楚日本强占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强行改变着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形式。这里没有享受现代文明的顺民,有的是多种多样或隐或显的反抗,最终他们把日本人赶出了家乡,满洲傀儡国就此消亡。

结 语

满洲傀儡国终止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被赶出了中国,《新满洲》杂志封尘入库。但是“新满洲”式的修辞术并未了无痕迹。伪满洲国的遗迹——建筑、铁路等——在中国东北还在,有人见此会感慨日本人在满洲的“建设之功”。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也向我们表明:“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费正清 57)。“在满洲建成了4500公里铁路,主要是日本在1931年后新建的[……]中国铁路,将近40%在满洲”(费正清

110)。这些洗净历史语境的抽象描述,很容易再次跌入帝国主义修辞圈套,貌似中立的公允的“事实陈述”,其实是摈弃了更重要的事实:殖民地原住民的苦难——社会和私人生活被强行改变,迅速进入一种陌生的现代生活,以及对殖民者毫无要求的屈从……

更重要是,帝国主义修辞,是要截断一个民族的生活历史,从外部给出一个社会生活的标准,比如发展,比如进步,比如GDP等,一旦社会生活不在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存在的意义,而以外部标准来衡量,生活于其间的过渡时期的人们的生存意义就将被抽空。

注释[Notes]

①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派出满洲事变调查团,李顿(Lytton)任调查团团长,1932年10月提交报告书,指出日本关东军并非“合法的自卫手段”、“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傀儡政权,不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并建议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日本不满国联裁定,1933年3月退出国联。非法的“满洲国”持续14年间,与其建交的国家与地区有: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中华民国南京汪伪政权、伪“蒙古自治邦”(内蒙古)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②《新满洲》,1939年1月在长春创刊,月刊,终刊于1945年4月,历时7年,共刊出74期。该刊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主办,创刊时编辑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编纂室主笔王光烈,从第4卷11月号开始由季守仁(吴郎)任编辑人,发行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常务理事日本人驹越五贞。关于《新满洲》杂志的具体编辑出版情况,请参见刘晓丽:《伪满洲国文学与文学杂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52-76,“从《新满洲》杂志看伪满洲国文学流变”章。

③“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7年3月29日,伪满洲国以敕令第41号公布《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法》,确认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为特殊会社,出版发行和销售一切教科书,编辑创办“国策”优良图书,印刷“国策”和一般图书,进口日本出版物。

④据李正中先生介绍,《新满洲》的刊名由日本人指定的。当时的一些中国文人,包括《新满洲》的编辑人王光烈和季守仁在内,对这个刊名非常反感(2005年4月18日,李正中答笔者问。存录音资料)。

⑤疑迟《凯歌》,由三部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曙》、《光》、《明》,连载于《艺文志》9—11期,1944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新满洲》5.8(1943):34-51。

[New Manchu 5.8 (1943): 34-51.]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杨品泉 张言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Fairbank, John K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12-1949). Trans. Yang Pinquan, Zhang Yan,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3.]

桂林:“协和之花”,《新满洲》1.6(1939):153-58。

[Gui, Lin. “Flowers for Harmonious World.” *New Manchu* 1.6 (1939): 153-58.]

稻川朝二:“失了故乡的人”,《明明》3.1(1938):63-65。

[Inagawa, Asajiro. “People out of Hometown.” *Mingming Magazine* 3.1 (1938): 63-65.]

冷歌:“宴会”,《艺文志》,创刊号(1943):122-23。

[Leng, Ge. “Banquet.” *Art & Culture Magazine* (The Inaugural Issue). (1943): 122-23.]

刘盛源:“新满洲怎样新的”,《新满洲》3.1(1941):25。

[Liu, Shengyuan. “How New is New Manchu.” *New Manchu* 3.1 (1941): 25.]

吕俊福:“介绍给希望留日的学生”,《新满洲》3.8(1941):84-88。

[Lv, Junfu.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 Longing for Studying in Japan.” *New Manchu* 3.8 (1941): 84-88.]

冈田英树著:《伪满洲国文学》,靳丛林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

[Okada, Hideki. *On Manchurian Literature*. Trans. Jin Conglin.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2001.]

秋萤:《小工车》。新京:益智书店,1941年。

[Qiu, Ying. *The Coolie Car*. Xinjing: Educational Book Company, 1941.]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 Li K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宋毅:“满洲一年的出版界”,《华文每日》12.1(1944):24-26。

[Song, Yi. “The Manchuria Publications in the Past Year.” *Chinese Daily* 12.1 (1944): 24-26.]

王秋萤:《去故集》。新京:益智书店,1941年。

[Wang, Qiuying.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the Past*. Xinjing: Educational Book Company, 1941]

疑迟:“明”,《艺文志》1.11(1944):95-121。

[Yi, Chi. “Bright.” *Art & Culture Magazine* 1.11 (1944): 95-121.]

支羊:“风土咏”,《新满洲》5.2(1943):71。

[Zhi, Yang. “The Song for Local Nature and Customs.” *New Manchu* 5.2 (1943): 71.]

(责任编辑:王嘉军)